

【書評】 Book Review

DOI: 10.6163/tjeas.2014.11(1)247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
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
(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金中燮
KIM Joongsub^{*}

近年來，重新追尋「東亞」，已成為東亞各國知識界的熱點議題。而「東亞」的概念或範圍為何，當然也是重要的（甚至是最基本的）思考主題。對於此，政治外交、國際關係等領域都會有不同的看法，而若從文化層面來論，有不少人認為可以用「筷子文化與漢字文化的交集」來界定「東亞」。這雖然不是嚴謹的學術定義，但筆者認為相當符合事實。¹

從漢字文化來說，眾所周知，生活在現代的東亞諸國人民在日常生活當中所使用的詞彙，有相當部分是共同的，而這些詞彙大多是由日本先開始使用、並隨著其他國家的近代化而傳播開來。現在即使是一般的中國民眾，大概也約略知道日常生活中有不少詞彙是來自日本，但當他們看到《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的歸類時，大概仍然很難接受有這麼多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詞語竟然是來自日本的「外來詞」。這些詞彙的範圍涵蓋了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哲學、科學……等幾乎生活的所有領域，但這些詞彙與漢語卻又是如此地水乳交融，以至於一般人根本就不會懷疑過這些詞是否是中國原創。

§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582頁。

Shen Guowei, *Jindai Zhongri cihui jiaoliu yanjiu: Hanzi xinci de chuangzhi, rongshou yu gongxi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582p.

* 韓國國立濟州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Jeju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south).

1 依照此定義，越南也可以、並且應該包括在內。

漢語吸收日文外來詞的過程，是與中國吸收新知識、近代化的歷程息息相關的，因此一直是學者關注的話題，沈國威教授的《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一書即是針對這個問題的最新力作。沈國威教授是日語專業，一九八五年後留學日本，現任日本關西大學外語學部教授。作者除了參考中文的先行研究成果之外，並參考了大量的日本國內資料，使得本書更具有參考價值。²

事實上，漢語中「日語借詞」的問題，語言學者已經有了不少的研究，本書也對這些研究成果作了詳細的整理介紹。相較於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側重在漢語如何接受日本漢字詞的方面，本書則有更多的篇幅探討日本方面的造詞過程。

全書分爲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緒論」先概述了相關的語言學、歷史知識，並整理介紹了包括中國大陸、臺灣、日本以及其他地區的相關研究。第二部分爲「新詞創造編」，討論了日本和中國在開始與西方接觸後的新詞語創制問題。作者指出，日本直到十八世紀中期，仍然主要是借用中國原有漢字詞語。而真正利用漢字創造新詞語，則是在十八世紀末與西方世界接觸後開始的。所謂「蘭學者」將荷蘭語翻譯成爲漢文（當時日本的主要文章書寫手段仍是漢文）的過程中，總結出了一套翻譯西洋語文的方法與模式。這些蘭學者的翻譯原則也成爲明治時期啓蒙思想家翻譯英法著作時的參考，但同時也有許多蘭學者翻譯的詞語被明治啓蒙思想家所修正。

明治時期啓蒙思想家翻譯西方著作時的另一個重要參考對象是來華傳教士在介紹西方新概念時所創的新譯詞。西方傳教士於明末開始來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這段期間，因傳教以及其他需要出版了大量的書籍、譯著、冊子、雜誌以及詞典等工具書，這些出版物對於近代漢字新詞的形成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作者詳細介紹了這些傳教士的貢獻，例如現在中國所使用的化學元素譯名，就是這一時期奠定的（並非受日本影響）；明治時

2 撰寫本稿之際，得知沈教授於2013年1月下旬前往香港城市大學進行講座，主題亦與本書相符。香港城市大學網頁有提供講座影片視頻，可參考。

http://www.cciv.cityu.edu.hk/content.php?p=info&id=shen_guowei

期許多日本人甚至是透過傳教士編的《英華詞典》來學習英語（這又足以證明當時日本知識階層熟悉漢文）；而在《漢語外來詞詞典》被歸類為日本外來詞的「保險」、「銀行」等詞其實也是日本援用傳教士的翻譯詞之後，重新傳回中國的。

第三部分為「語言接觸編」，介紹了中日語言接觸的過程。作者指出，中國人雖然很早就接觸日本書籍，但一直到明治以後，才意識到日文是與漢文不同的「外文」（這當然還與日本書寫文字的轉換有關）。但即使如此，日文仍然是比西歐語更加容易親近的語言。接下來面臨的是是否有必要透過日本學習西洋的問題，對此，作者指出由於當時張之洞、康有為等人的宣傳，使得中國人認為透過日本學習新知識是最快捷的途徑。作者詳細介紹了康有為所編的《日本書目誌》，該書百科全書式的整理了日本所有領域的新書，當然也連帶地引進了相關的詞彙。

第四部分為「詞彙交流編」，作者以黃遵憲的《日本國誌》〈刑法誌〉、日人古城貞吉為《時務報》所撰寫的〈東文報譯〉、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辭典《辭源》、一九一六年出版的英漢辭典《官話》為文本，分析了日語借詞流入漢語並在現代漢語中穩定下來的過程。

第五部分為「詞彙考證編」，在此，作者以「熱帶」、「陪審」、「化學」三個詞彙為對象，通過鉅細靡遺的考證，分析了其成立、流傳的過程。作者指出，這三個詞都被歸類為日本漢字詞，但其實是來華傳教士先行翻譯而後傳至日本的。

為何許多詞彙是西方傳教士先在中國翻譯，但卻未能普及，最後透過日本重新輸入？作者也對此給出了說明，亦即，當傳教士通過翻譯引介西方文物時，一方面當時中國的知識階層對西方文物並不感興趣，另一方面，又認為這些翻譯文字不夠典雅而感不屑（由於傳教對象是平民百姓）。

而這種對典雅的追求，一直延續到了中國知識階層開始積極引進西方文物之時。著名的翻譯家兼啓蒙思想家嚴復就認為來自日文的詞彙不夠

「訓雅」而大加抨擊，並試圖以更爲「訓雅」的翻譯取而代之，但卻慘遭失敗。³

梁啓超本身也是宣傳日本漢字詞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但即使如此，他也仍不時對日本漢字詞表示不滿。例如，書中提到了梁啓超與嚴復針對"Economy"應該如何翻譯在《新民叢報》上所進行的討論，嚴復提出「理財」、「計學」等譯法，梁啓超則提出何不用更古典的「食貨」、「貨殖」、「平準」，亦有其他讀者投書參與討論，可謂是絞盡腦汁，但終究發現不如來自日本的「經濟」適合。

爲何當時中國頂尖知識分子的智慧竟不敵日本的漢字詞？對此，語言學者提出許多解釋，例如隨著白話文的普及，古漢語的詞彙反而顯得格格不入，複音詞彙大量取代原來的單音詞等；但日本人所選用的翻譯詞彙其實本來就很合乎中國人的語言感覺（特別是在白話文之後），應該也是原因之一。⁴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漢文（文言文）仍然是東亞知識階層的共同書面語，因此無論日本、朝鮮或越南，知識分子的漢文程度應該與中國知識分子沒有太大的差異。而且，日人造詞時也同樣經歷了研究考證、深思熟慮的智慧累積過程。因此，日本漢字詞能被中國人廣泛接受，可以說是極其當然的。⁵

3 此部分書中亦有介紹，但更詳細的內容可參見黃克武：〈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月），頁1-42。

4 王力在《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中指出，五四前後漢語的詞彙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學術文章中70%的詞彙是新詞，而這些新詞大部分來自日本。針對此一現象，他認爲日本的譯法也都是根據古代漢語，「如果是漢人先譯，可能也是這樣譯的，但實際上是日本人先譯，中國人也照抄了」，或者「漢人先譯，很可能不是這個樣子，但是日本人先譯了，漢人看看也還順眼，也就用開了」。參見王力：《漢語史稿》，頁529-531。

5 對於當時國人對日本漢字詞的批評，王國維說：「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以"sympathy"一詞爲例，嚴復譯爲「善相感」，日本譯爲「同情」，王國維評說：稍有知識者，即可知日譯較優。見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房鑫亮、胡逢祥、徐旭晟（編校）《王國維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26。

我們透過本書回顧中日詞語交流的歷史後，可再回頭思考本文開頭所提到的「東亞」或「漢字文化圈」的問題。長期以來，東亞各國的知識階層以漢文為正式書面語，漢字文化圈確實存在無疑。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的文化中心地位開始動搖，到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由於民族主義的潮流，周邊各國都開始推廣自己的民族語言，再加上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漢文的共同書面語的地位也開始崩潰。在此之際，筆者認為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就是：日本在吸收西方文明時，大部分的詞彙並未用音譯方式，而是用漢字來意譯。

前面也提到當時日本漢字還很普及，因此也許日本用漢字翻譯是理所當然，但從許多資料來看，當時日本也已經有不少音譯的嘗試，甚至一些中國的學者反而更強烈地主張用音譯來代替日本的意譯漢字詞（例如嚴復），但日本譯者最終還是大部分採用意譯。⁶

因此可知，當時的日本知識階層的思維模式中，仍然認為必須透過漢字才能較為完善地表達思想或意義；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認為漢字是一個「他者」。⁷由於日本對漢字的這種態度，才形成了今天所謂的「漢字文化圈的共同詞語」。設若當初日本是採用片假名標記的音譯方式，相信今天「漢字文化圈的共同詞語」絕對會是另一種模樣（甚至不存在）。

如果再看今天日本（以及韓國）對於一些新事物、新概念的翻譯方式，更將能感受到今昔的差異。例如國際關係中的"Global Governance"，中文譯成「全球治理」，但日文則乾脆直接採用音譯（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這樣的例子在日文中可以說不勝枚舉，而且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這當然不會是因為日本人變懶惰了，⁸這除了意味著西方仍然握有文化霸權

6 例如，本書提到，"chemistry"一詞日本原來音譯為「舍密」，之後改採來華傳教士所譯的「化學」。筆者案：本書評稿之審查委員指出，「舍密」一詞應為荷蘭語"chemie"之音譯。經筆者查證，「舍密」出自"chemie"之說可見於潘吉星所著《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沈書中亦有參考潘吉星之論著，但並未指出該詞出自荷蘭語，或許是作者認為一般讀者較熟悉英文之故。特此誌之，並感謝評審委員的指正。

7 相較於二戰之後韓國、越南對漢字的排斥政策，即可看出當時日本的態度是相當特殊的。

8 事實上，如果與百年前啟蒙思想家「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嚴復語）的勞神相比，音

外，還顯示日本對於漢字的態度發生大幅的變化：意義的表達或傳達，已經不再是非漢字不可了。⁹這種變化，對於我們想像「漢字文化圈」或「東亞」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也許是在閱讀本書之後，必須思考的問題。

譯省力何止百倍。特別是，如音譯為漢字，則還必須稍加考慮漢字原有的意義是否突兀，但音譯為表音文字（如日本的假名或韓文字母），則根本只是標示發音而已。

⁹ 而這種情況，在韓國則更加徹底。現今日本在書寫時仍然保留相當數量的漢字，韓國在一般書寫時則已完全不用漢字，兩國的手機短訊就是最明顯的例證。